

一、近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基础

(一)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1.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

(1) 清朝统治由盛到衰

鸦片战争前，中国是处在清朝统治下的封建社会。清朝是 17 世纪 40 年代在明末农民起义推翻明朝的形势下，由满族贵族入主中原而建立的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在顺治之后的康熙（1662 年—1722 年）、雍正（1723 年—1735 年）、乾隆三代（1736 年—1795 年），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国家政权、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达到其统治的鼎盛时期，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康乾盛世”。

政治上，建立了一个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满汉地主阶级政权，稳固了清政府的统治。同时，又不断地削弱宗室贵族大臣的权力，增强皇权，从议政王大臣会议到南书房、军机处，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在竭力维护满族贵族特权的同时，对汉族地主阶级执行了笼络、控制和利用的政策，扩大了统治基础。1673 年至 1681 年先后平定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的“三藩”叛乱，进一步加强了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统治。经济上，采取轻徭薄赋、垦荒屯田、兴修水利等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边防上，康熙年间两次雅克萨战争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沙俄的侵略气焰，1689 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长时间内确保了北部边疆的安全。文化思想上，则十分注意利用汉族文

化思想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广泛影响，推崇尊孔读经，程朱理学，大兴文字狱，加强了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控制。

总之，这一时期，国家统一、政权巩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当时中国的疆域北接西伯利亚，南跨台湾和南海，东北至兴安岭和库页岛，西达葱岭和中亚巴尔喀什湖，形成了一个版图空前辽阔的大帝国；全国耕地面积超过明末最高数字；人口达 3 亿以上。

乾隆之后，清朝统治迅速走向衰落。传统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以封建宗法制度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以封建儒学为统治思想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结构，已经成为新生产方式诞生的桎梏，阻碍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到嘉庆（1796 年—1820 年）、道光 1821 年—1850 年）年间，清王朝的统治已极其腐败，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已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

在经济生活中，鸦片战争前夕土地兼并已十分剧烈，广大农民受着极其残酷的封建剥削，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制依然是清朝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皇帝和皇室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嘉庆年间，全国耕地约 8 亿亩，而皇室庄田、八旗庄田及政府控制的屯田就占了 1/10；全国民田大部分也都为官僚和地主所占有。乾隆的宠臣、大学士和珅占有土地 5.3 万多公顷，他的两个管家也占有土地 4 000 公顷。乾隆之后，豪门权贵兼并土地愈加严重，道光的大臣琦善一家占有的土地竟达 17 万公顷之多。广大农民丧失土地，纷纷沦为地主豪绅的佃户，在地租、徭役、高利贷及贪官污吏的敲榨勒索下，终年勤劳，难得温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趋于尖锐，社会更加动荡不安。过速的人口增长，也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1764 年，全国人口约为 2.56 亿人，1812 年增至 3.33 亿人，到 1835 年达 4 亿多人。人口增长速度越来越快，而耕地面积不可能成倍增长。嘉庆年间全国人均耕地 0.13 多公顷，首光年间下降到不足 0.13 公顷，这也

造成流民增多，加剧社会动荡。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虽然产生了，但是，也只限于沿海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有限的几个手工业门类，而且其发展是十分缓慢的和艰难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和封建剥削，严重地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发展停滞，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

在政治上，到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的统治也已达到了危机四伏、极其腐败的程度。在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下，各级官吏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官场败债与日俱增，贪污贿赂成风。乾隆时的宠臣和珅为官 20 余年，嘉庆年间被参处死，抄没家产，为数极多，当时就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讽刺描述。道光年间，外敌日逼，祸在眉睫。但皇帝骄傲自大，封疆大吏孤陋寡闻，许多人连英国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朝廷上充斥的是老朽官僚，各级地方官吏，只知道搜刮民膏，不知理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便是他们中饱私囊的真实写照。

与政治腐败相联系的是军备废弛，军队战斗力削弱。八旗兵自入关以后便忙于圈占土地，优闲享受，他们俸禄优厚，承平日久，昔日骁勇善战之风一扫而光，特别是自鸦片输入中国以来，八旗士兵普遍吸食鸦片，几无战斗力。专募汉人组成的绿营兵也不堪言战。清朝军队的武器相当落后，八旗军和绿营军均以原始的刀、矛、弓箭、藤牌、甲骨和少量火绳枪、滑膛炮等兵器作装备。海防边塞有些仍延用 300 年前的旧炮。水师所有战船，多是薄板旧钉。军队营务松弛“册多虚具”“粮多冒领”“老弱滥充”、“训练不勤”、“约束不严”，如此腐败的军队，足以扰民，却不足以卫国。总数达百万余人的清军不堪一击。

总之，清朝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腐朽统治，使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社会危机四伏。1796 年，湖北爆发了白莲教农民大起义，起义波及 5 省，持续 9 年，是清朝由盛转衰的重要标志。1813 年的天理会起义，曾有一支起义军一度潜入北京。此后，各地的

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这一切表明，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到鸦片战争前夕，清朝的封建统治已十分腐朽，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

(2) 清朝对内对外政策

清朝建立后，一直采取的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对内对外政策，它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专制和严格的闭关自守。对内表现为政治上的中央集权 经济上的重利盘剥 文化上的高压专制 对外表现为闭关锁国、盲目排外，拒绝学习和接受外国的一切先进的东西。

政治上，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大部继承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建立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政权。皇帝是一切权力的中心，全国上下一整套庞大的官僚机构维系着皇权的统治，形成绝对的高压专制政治。中央设内阁，内阁以下设 6 部，是国家的中枢机构。清初还于内阁之外设有由满族贵族参加的五大臣议政会议，由皇帝直接主持，处理重大机密要务。雍正以后，改设军机处。实际上军机处是为皇帝处理事务的秘书处，军机大臣位高权轻。地方上则设有总督和巡抚，作为皇帝派出的封疆大吏，执掌一省或数省的军政大权。省以下有道、府、州、县，设道台、知府、知州、知县。但从总督到知县的各级官员都是皇帝的私人代表，一切对皇帝负责。清王朝依靠这一套机构实行着严密的控制，镇压人民的反抗。

经济上，由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广大农民失去土地，只得成为地主豪绅的佃户，受尽盘剥。统治阶级将沉重的地租强加在农民头上。清朝的地租率一般都在 50% 以上，有的地方甚至高达 60%~70%。此外，还有繁多的苛捐杂税，徭役及高利贷的剥削。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造成了农民的贫困，也阻碍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当时，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着统治地位，一家一户的“男耕女织”模式依旧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尽管康熙、乾隆时期江南和沿

海地区在丝织业、棉纺业、陶瓷业、制铁业和造纸业等行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仍是十分微弱。

文化上，同样体现了专制主义的特点。为了消弭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满”思想，清朝一开始就采取高压手段，实行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不仅用孔孟之道、程朱理学来束缚民智，而且严禁结党，大兴文字狱，对稍有不满意甚至完全无辜的知识分子，动不动就杀就斩，甚至株连九族。例如，清乾隆二十年（公元 1755 年），广西督学胡中藻有“一把心肠论浊清”的诗句，乾隆批示，“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胡中藻即被凌迟处死。仅乾隆朝类似这样的文字狱，有记载的即达 70 多起。迫于高压政策，知识分子的思想被禁锢，言论不得自由，被迫面向故纸堆，致使思想界和学术界万马齐喑，毫无生气。

对外，清朝一方面严格限制中国人民出海贸易和居留海外，严格限制货物出口；另一方面则严格限制来华外国人的活动，防范中国人与外国人接触。清朝初年，为了镇压东南沿海地区以郑成功为首的反清斗争，曾于 1656 年下令，片帆不准下海。1863 年，清王朝统一了台湾，于次年撤销海禁，实行对外贸易，开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个口岸对外通商。1757 年又取消了三个通商口岸，只留广州一口通商，实行严格的“公行”制度。一口通商、公行制度和对外商人的限制构成了清代的闭关锁国政策。

闭关锁国政策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封建的自然经济是闭关政策的经济基础。清朝统治者满足于简单再生产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没有保护和发展对外贸易的愿望和要求。乾隆皇帝谕称：“天朝无所不有，原不管外洋货物以通有无。”其次，封建当权者骄傲自大、盲目排外的传统观念是闭关政策的思想基础。他们视异国为“蛮猪夷狄”、“化外之民”，因而既不用了解，更谈不上学习。再次，闭关政策也

是清政府对付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简单手段。当西方资本主义试图以海盗方式骚扰中国东南沿海时，用这种办法拒之于国门之外，确实曾起过一定作用。但是，当西方决心用武力征服时，这种消极的防御只能使自己处处被动。最后，清朝实行严格的闭关政策是为了隔绝人民与外界的联系，以利于其专制统治。

闭关自守的政策，最终没能抵挡住、也不可能抵挡得住西方的侵略，它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消极的深远的影响：它阻碍了国内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孤立和停滞；它强化了中国固有的因循守旧的封建传统意识，小农思想和狭隘的宗法观念，使中国人闭目塞听，统治阶级对待新的政治文化思想，夜郎自大，拒绝接受一切外来先进的文化思想和政治制度，拒绝一切改革和借鉴；妨碍了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人民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总之，这种政策只能阻碍自己的发展，使中国与世界的距离越拉越大，这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之一。

2. 鸦片战争前的世界

(1)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迅猛发展

正当中国处在清朝的封建制统治下缓慢发展的时候，世界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在欧美迅速兴起，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代替了封建制度，产业革命使欧美的国力得到迅猛的发展。

17世纪40年代，正当满族贵族入主中原，建立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政权时，在西方，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革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确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以国会为阵地，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要求，同时以两次国内战争挫败了王党势力的反扑与叛乱。经过40余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终于于1688年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从而正式开始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英国的统治。我国“康熙盛世”时期，新兴的英国资产阶级已通过内阁制，确立了资产

阶级议会制度的政治体制，从而在政治上日益成熟；在经济方面，推行符合本阶级利益的土地政策、移民政策、税收和贸易政策，不断扩大资本的原始积累，扩大国内外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为产业革命的到来作了最充分的准备。

18世纪后半叶，英国又率先进行工业革命，随着蒸气机的发明和推广，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主要社会产品的产量迅猛增长，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到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英国已完成了工业革命，英国成了工业的“太阳”，其他国家则成了农业的“行星”。

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仅次于英国。英国社会的发展给了法国以重大影响。1789年法国大革命，涤荡着欧洲大陆的封建势力，为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更推动着产业革命的发展。30年代至40年代，法国的钢铁与棉织品的产量都有了比较大的增长。工业生产中普遍使用了机器，交通运输也迅速发展起来。

18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北美通过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美国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建立了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资本主义发展迅速追赶着英、法，19世纪上半期美国也完成了工业革命，农业机器制造在数量上已超过欧洲各国。

除英法美以外，欧洲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也程度不同的得到发展。19世纪中叶，俄国在政治上还保持着封建专制与落后的农奴制度，但资本主义却在逐步发展。资产阶级虽然还没有掌握政权，沙皇政府却一直在扩张领土上追随英法之后。

(2)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东方的侵略扩张

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寻找和开辟更广大的工业产品市场和廉价的工业原料，疯狂地对外扩张，开辟出一条条新航路，强迫别国缔结通商条约，以武力掠夺别国领土，使其成为殖民地。英国是老牌的殖民国家之一，早在17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即侵入印度，并在那里建立了垄断东方贸易的东印度公司。19

世纪初，英国完全控制了印度，印度成了英国的殖民地。与此同时，英国又占领了新加坡、侵入缅甸等中国西南周边国家。逐步地通过对周边国家的蚕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辟了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在早期交往中，1637年（明崇祯十年），英国武装商船首次来到中国，就曾发生英船炮击中国虎门炮台的挑衅事件。1699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商馆，到18世纪下半叶，英国已跃居各国对华贸易的首位。此后，英国更积极地以印度为基地，图谋在中国获得更大的利益。清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英法间在欧洲正发生“半岛战争”，英国的印度总督借口防止法军侵略澳门，派出舰队到澳门附近登陆，并且进入黄埔。清朝政府下令广东地方官员武力对付。英国方面这时还没有对中国进行战争的准备，事态没有扩大。但是东印度公司的老板们已经打算凭武力实现他们对中国的野心了。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清朝一位关心“夷务”的官员指出：“迩年以来，有英吉利贸易夷人，自恃富强，动违禁令。而其余各国，遂亦相率效尤，日形狂诞”。英国只是等待时机发起对中国的进攻。法、美紧随英国之后，觊觎中国的领土和资源。

北方的俄国曾是一个长期处于封建农奴制统治下的国家。16世纪后半叶至17世纪上半叶就越过乌拉尔山，向中国境内扩张，尽管清初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使沙俄的野心暂时受到阻遏，但它仍然时刻准备夺取中国东北、西北的大片领土。

总之，鸦片战争前夕，当清朝由盛而衰；“内乱”不已；“外患”临头之时，西方列强经过产业革命，资本主义却正在蒸蒸日上。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①。而幅员辽阔，古老落后的中国

^①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卷，547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4。

便成为欧美列强殖民掠夺、侵略扩张的主要目标，他们正千方百计寻找借口打开中国的大门。

（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1. 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程

（1）鸦片战争，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

1840年6月，英国政府为保护鸦片贸易而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对华战争，这就是导致近代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折的鸦片战争。

如前所述，早在18世纪中叶，英国在产业革命前夕，已在西方各国的对华贸易中占居首要地位；18世纪中叶以后，对华贸易继续扩大发展。在从1760年至1833年的70多年中，英国对华货物输出总值增长了15倍，从中国输入货物总值也增长了9倍。英国商人从中国输入的货物以茶叶为大宗，其次是生丝、土布、陶瓷和中药等。

但是，中国当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英国的工业品有着顽强的抵抗能力，清政府长期以来严格实行的闭关政策更坚决地阻碍着英国工业品在中国畅行无阻，使得英国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努力收效甚微。在中英贸易关系中，中国一直是处于顺差的地位。18世纪东印度公司运往中国的毛织品几乎年年亏本，金属制品的销路也极其有限。到19世纪初，情况也没有多大改变。因此，尽管英国政府和商人在中英贸易中获得极大利润，但英国资产阶级对中英贸易中所处的逆差地位大为不满，对以现银抵补巨大的贸易逆差难以忍受。

为了改变不利的贸易地位，英国资产阶级千方百计，企图以各种方式打开中国的大门，其中包括积极酝酿对华战争，以武力实现目标。1792年，英国政府曾派马戛尔尼为特使来到中国，

要求清朝在广州之外，增开宁波、舟山、天津等口岸，允许英国派官员常驻北京，并要求在沿海为英国商人觅寻居留地。代表泱泱大国的清朝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1816年，英国又派使臣来中国，提出类似要求，同样遭到拒绝。1825年，英国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英国资产阶级为转移国内矛盾，维护和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为了倾销过剩的商品，迫不急待地要求打开中国市场，便多方策动英国政府武装入侵中国。1836年，一批与侵略中国有密切利益关系的英国资本家在伦敦专门成立了“印中协会”，不断为英国政府提供情报，出谋划策，加紧侵华准备。

在中英贸易上，英国资产阶级也终于找到了一种既在中国有广泛销路，又可获得巨大利润的特殊商品——鸦片。通过这一罪恶的交易，英国逐步扭转了对中贸易的不利局面，而中国则由出超国沦为入超国，贸易逆差迅速增加。

鸦片，俗称大烟，又称罂粟，是一种强烈的麻醉性毒品。鸦片大量进入中国，不仅使清朝的白银大量外流，引起财政困难，而且严重损害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极大地破坏社会生产力，削弱军队的战斗力。清政府的统治也因此日益现出危机，鸦片走私中的贿赂丑行，几乎腐蚀了整个统治机构。事态的严重性正如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所说，如听任鸦片泛滥，“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皇帝于1838年底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

林则徐是禁烟派的主要代表，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到达广州后，立即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共谋禁烟，以严厉果断的措施，迫使英美烟贩交出鸦片2万余箱，共计118.5万公斤，并于1839年6月3日至25日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虎门销烟是广州禁烟的重大胜利，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和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与决心，揭开了近代中国连绵不断的反帝爱国斗争的序幕。在禁烟运动中，首当其冲

遭到打击的是英国侵略者。于是，英国资产阶级狂妄地以此为借口，气势汹汹地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从 1840 年 6 月开始到 1842 年 8 月结束，历时两年两个月。尽管在战争中沿海军民浴血奋战，爱国将领关天培、葛云飞、裕谦、陈化成等一大批爱国官兵壮烈殉国，但由于清政府的昏庸腐朽，终于以 1842 年 8 月 29 日签订《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而宣告失败。

《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其主要内容是：割让香港；赔款 2 100 万银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英国货物进出口关税须经两国协定即所谓“协定关税”；取消公行制度，两国商人实行自由贸易。1843 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这个条约规定了“值百抽五”的关税税率，英国又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

美、法两国趁火打劫，继英国之后，强迫清政府于 1844 年 7 月签订中美《望厦条约》，10 月签订中法《黄埔条约》，也获得了英国所取得的除割地、赔款以外的一切特权，还获得了兵船可以进入中国沿海港口和在通商口岸传教的权利。

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等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政治上，中国的独立主权受到严重侵犯，领土完整遭到破坏，司法、关税等主权开始丧失，中国开始受制于西方列强；经济上，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强烈冲击，逐步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商品市场和廉价原料的供应地。第一次鸦片战争成为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起点。

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资产阶级特别是英国资产阶级欣喜若狂，他们以为从此开辟了世界上最广阔的商品

市场。签订（南京条约）的英国代表、侵略分子璞鼎查，回到伦敦后曾在英国议会得意地宣布：倾兰开夏全部纺织厂的产品，也不能满足中国一个省日常需要的布料。而事实却令英国资产阶级颇感失望。英国工业品在中国的增长势头仅保持了二三年，1846年以后，英国对华商品输出开始下降，到1856年的10年里，每年停留在150万至200万英镑左右。正如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一文中指出的：“1842年条约在促进英国对华出口贸易方面，没有发生丝毫作用”^①。相反，这个期间从中国输往英国的商品总值却增长了近1倍，从每年的500万英镑增加到1000万英镑。这是英国资产阶级所始料不及的。

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中国社会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在鸦片战争后并没有立即解体，并且顽强地抵抗着外国商品的渗透；其次是由于鸦片战争后英国商人继续疯狂地向中国贩卖鸦片，掠夺了中国的大量白银，大大地削弱了中国人的商品购买力，尤其是鸦片贸易在《南京条约》签订后更加畅行无阻，白银外流，通货紧缩的情况比鸦片战争前更为严重。英国资产阶级却不正视这一事实，只把工业品的滞销归咎于中国通商口岸开辟得太少，英货转输内地缴纳税收太重等。同时，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英国和法国的工业生产都有了进一步发展，更迫切要求扩充市场。于是他们决定再次打开中国的大门，掠夺深入内地的权利，增开商埠、降低子口税和鸦片贸易合法化等新的特权。

1856年10月，英法利用“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联合发动了侵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又称“英法联军”之役。美国和俄国则是英法的帮凶。因此，这场战争实际上是西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7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方列强共同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从 1856 年 10 月正式爆发到 1860 年 11 月结束，历时四年多。其间，中国广大民众和清朝爱国官兵曾英勇杀敌，取得过大沽口自卫反击战的重大胜利，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但战争仍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英法侵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特别是 1860 年 10 月，他们在北京洗劫和烧毁了融中外建筑艺术精华的“万园之园”——圆明园，造成中国及世界文化史上无可挽回的损失，充分暴露了西方侵略者贪婪、野蛮、凶残的本性。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先后于 1858 年 6 月和 1860 年 10 月分别同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作为英法侵略者帮凶的俄国和美国，则乘机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璦琿条约》、《北京条约》和中美《天津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西方侵略者又在中国得到了大批特权：1) 割让九龙司给英国；2) 开放牛庄（营口）、登州（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津为通商口岸；3) 2.5% 的子口税，中国海关由英国控制；4) 鸦片贸易合法化；5) 准许外国传教士在内地自由传教；6) 外国得派公使常驻北京等。此外，俄国通过《璦琿条约》、《北京条约》和其后的《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等，吞并我国东北、西北共 140 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夺取了中国的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加在一起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①。俄国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大获利者。总之，这是继《南京条约》后西方侵略者对中国主权的又一次空前掠夺，也是清朝统治者对中国主权的又一次空前出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 版，第 1 卷，73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第二次鸦片战争加速了西方侵略者与中国封建统治者之间的勾结。战争使西方侵略者认识到，征服腐败软弱的清政府不难，困难的是征服英勇反抗的中国人民。与其打垮清朝，直接进行殖民统治，还不如扶植它作为西方统治中国的工具。清朝统治者也认识到西方侵略者并没有取而代之的野心，只要做到“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清朝的统治就可以平安无事了。为适应西方侵略者的要求，清政府于 1861 年 1 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管外交及通商、海防、关税等对外事务，由奕訢主持。3 月以后，英、法、美、俄等国纷纷在北京设立使馆，便于就近控制清政府。这年 8 月咸丰皇帝病死热河，6 岁幼子载淳继位。载淳生母叶赫那拉氏（即西太后）与奕訢勾结，在外国公使支持下发动辛酉政变（又称祺祥政变），慈禧太后掌握了清朝的统治权。1862 年 1 月，清政府正式确立了“借师助剿”的反动政策，标志着清政府开始以洋人为靠山，成为外国侵略者统治中国的工具。从此，中外反动势力互相勾结利用，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2）甲午战争，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的加深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当中国社会日益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演变之际，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则正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投资已经饱和，出现了大量“过剩资本”，必须到国外寻找更广阔的投资场所。因此，占领更多的殖民市场，为资本输出寻找新的投资场所，就成了帝国主义生死攸关的大事，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更加激烈。但到 19 世纪末，世界殖民地已经被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完毕，而像中国、波斯、土耳其这样一些尚待瓜分的半殖民地国家，便成了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主要对象。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后大门虽被打开，但是帝国主义列强已经不满足于原来所取得的开辟通商口岸、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等特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列强不惜

支持新崛起的日本发动新的侵略战争，以使用战争手段获取更多特权，为资本输出扫除障碍，以在中国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美国看到日本在远东的战略地位，希望日本成为美国的帮凶；英国为了对付俄国的南进，也把日本看作是一个可以联合的力量。

1894年，日本悍然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这场战争在日本方面是蓄谋已久、做了充分准备的。经过1868年的明治维新，日本走上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日本农村中的封建关系仍然大量存在，浓厚的封建主义因素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也都在起作用。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和残余的封建经济以及天皇制的国家机构相结合，使日本一开始就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侵略性。明治政府一建立，就确定了“强兵为富国之本”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并制定了以侵略中国、朝鲜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其步骤是：第一期征服我国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我国东北，第四期征服中国，第五期征服世界。明治政府逐步把政治、经济、文化都纳入军国主义轨道，竭力扩军备战。

这样，朝鲜首当其冲成为日本侵略的目标。朝鲜在腐朽的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同时统治阶级内部各派也在相互倾轧。日本侵略势力乘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渗透到朝鲜内部。1876年，日本就以武力胁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使朝鲜沦为半殖民地。1885年，日本政府派宫内大臣伊藤博文来华，和李鸿章订立了《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今后若发生重大变乱，中日两国或一国需要出兵朝鲜时，必须事先互相通知。

但是，日本于1894年6月趁朝鲜爆发东学党领导农民起义之际，悍然挑起中日战争。从7月日本对“代韩勘乱”的清军发起丰岛海战至日军攻占辽东半岛，甲午战争历时共8个月，其中重要的战斗有朝鲜之战，黄海海战，金州、旅顺战役，海城之战，威海大战。在整个战争中，清军广大士兵和一部分爱国将领

为保卫祖国，维护民族尊严，同凶残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战斗。如丰岛海战中，“济远”号爱国官兵坚决抵制管带方伯谦的投降行为，协力奋战，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高升”号、“致远”号、“定远”号都表现得十分英勇。特别是“致远”号管带邓世昌为掩护旗舰，指挥受重伤的“致远”号全速冲向敌舰，不幸为敌鱼雷击中，全舰官兵壮烈牺牲。左宗贵血溅平壤，丁汝昌、刘步蟾以身殉国。在近代反侵略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但由于清王朝已腐败透顶，统治者昏庸无能，结果使得清军陆军主力损失殆尽，北洋海军全军覆灭。

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始终抱着乞求帝国主义“调停”和向日本求和的心态。双方开战不久，慈禧就指使李鸿章进行求降活动。

1895年3月19日，“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偕美国顾问科士达等人到达日本马关。20日，同日方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及其美国顾问端迪臣在马关春帆楼开始谈判。日本气焰嚣张，无理要价。李鸿章哀求从善改议，被伊藤博文无理拒绝。在日寇的淫威下，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被迫在日本马关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无条件接受了日本的全部侵略要求。条约的主要内容是：1) 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2) 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3) 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白银。4) 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船可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5) 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运销内地只按进口货纳税，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条约中还规定，为保证中国履行条款，日军暂时占领威海卫。

《马关条约》是日本在西方列强支持下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也是自《南京条约》以来，签订的最严重的丧权辱国的条约。《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大片的中国领土，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二万万两白银则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收

入，这样数额巨大的赔款全部被清政府转嫁到人民的头上，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以资本输出为主要手段的新阶段，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

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与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整个形势相适应，各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激烈争夺，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首先，帝国主义通过大量的政治性贷款控制清政府，操纵中国财政。在甲午战争后的 3 年里，清政府被迫先后 3 次向俄、法、英、德借款 3 亿两白银。这些借款利息高、折扣大、还本付息时竟达 7 亿两白银以上，还规定以中国海关收入和盐税作担保，使中国又丧失了很多主权。其次，列强纷纷在华投资设厂、筑路开矿，加紧经济渗透与控制。《马关条约》中准许日本臣民在中国设厂的规定，适应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需要。战前，列强在中国设立工厂即使依据不平等条约也属非法，现在西方各国却援引“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先后享有这项新的特权。他们可以在中国“合法”地经营各种工业。据不完全统计，从 1896 年到 1900 年，各国在华开办的工厂达 930 家，投资在 1 亿两白银以上，帝国主义在华逐渐垄断了金融和航运业，操纵了中国的轻重工业和交通运输，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生产的产品大部在中国销售，这更直接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口岸的通商通航，又使中国最富庶的长江流域，从江浙到四川，全部都向帝国主义开放。这样，列强扩大商品倾销，1898 年进口货总值比 1894 年增加了 29.3%。同一时期，列强也加紧掠夺中国的原料，土货出口总值增加了 19.4%；最后，割让宝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破坏了中国领土上的完整，而且刺激了帝国主义掠夺瓜分中国领土的野心，加